

刘亮程 著

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飘忽，一阵风一样没有着落。
也许为弥补那次行旅的急促，梦中我又沿那条长路走过无数次。

驴车上的 龟兹

散文

LUCHESHANG DE QIUCI

春风文艺出版社



驴车上的龟兹

刘亮程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刘亮程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驴车上的龟兹 / 刘亮程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13-3149-0

I. 驴…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8285 号

驴车上的龟兹

责任编辑 常晶 施凌飞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责任校对 范丽颖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传真 024—23284391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
幅面尺寸 160mm×215mm
字数 95 千字
印张 7
印数 1—10 000 册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526528

目 录

1	一切都沒有過去
4	最後的鐵匠
10	正在失傳的手藝
26	生意
31	木塔里甫的割禮
35	兩個古幣商
41	五千個買賣提
45	尘土
47	通往田野的小巷
50	龜茲駱志
58	托包克遊戲
64	阿格村夜晚
66	熱斯坦巷早晨
69	逛巴扎
80	我另外的一生已經開始
84	暮世舊城
90	無法說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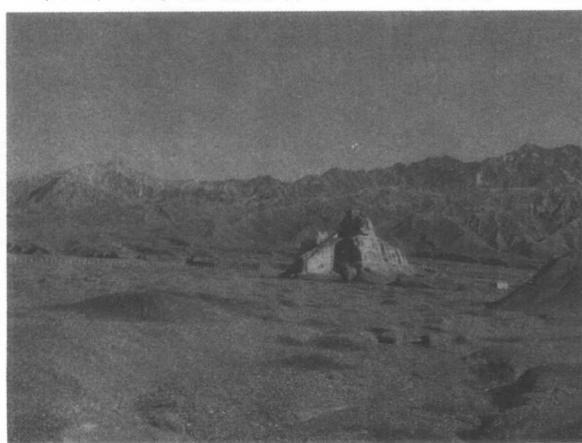
驴车上的龟兹



一切都没有过去

我对库车的兴趣缘于许多年前的一次南疆之行。那时我刚从新疆北部一个偏僻小村庄走出，天山以南的南疆对我还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地域，我对迎面而来的更广阔无边的戈壁荒漠惊叹不已。那是一次漫长而紧促的行旅，几千公里的路途，几乎没有在哪儿停顿过，沿途一阵风一样穿过的那些维吾尔人居住的村落城镇，就像曾经的梦境般熟悉亲切。低矮破旧的土房子、深陷沙漠的小块田地、环屋绕树的袅袅炊烟，以及赶驴车下地的农人——仿佛我是生活其中的一个人，又永远地置身其外。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飘忽，一阵风一

样没有着落。也许为弥补那次行旅的紧促，梦中我又沿那条长路走过无数次。



我记得我们在一个周五黄昏到达库车老城，满街的毛驴车正在散去。那是老城每周一次的巴扎（集



市)日。我们停车在库车河边,在写有“龟兹古渡”桥头旁的一家维吾尔族饭馆吃晚饭,街上一片凌乱,没卖掉的农具、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拾起来,装上毛驴车。赶集的人渐渐走散,消失在夕阳尘土里,临街的门窗悄然关闭,仿佛库车的热闹到此为止。只有街对面,一位蒙面的维吾尔族妇女,依旧端坐在那里。她的褐色面纱一直垂到膝盖,卖剩的半筐馕摆在面前,街上离散的人群似乎跟她没有一点儿关系。

那时我对库车的历史知之甚少,现在仍不会知道更多。除了史书上有关库车——古龟兹国的一些片断文字,以及残存在这块土地上让人吃惊的千佛洞窟和古城遗址,库车的历史从来就没被谁清晰地看见过。

而比历史更近的,坐在街边卖馕的那个维吾尔族妇女的生活,已经离我十分遥远了。在我看来,她的蒙面褐纱并不比两千年的历史帷幕单薄。她从哪里来,她叫什么名字,在这座老城的低矮土巷里,她过着怎样一种生活。她的红柳条筐是千年前的模样,她卖剩的馕仿佛放了几个世纪。还有,她的面纱后面,我永远看不见的容

颜,一双怎样的眼睛透过褐色面纱在看着我们,看着这个黄昏人世。

我禁不住走过去,向她买一块馕。多少钱一个?我想听听面纱背后的声音,却没有,她只微微抬臂,伸出一个指





头。我递给她一块钱。

那块馕上肯定落了一天的尘土，我看不见。馕是麦黄色的。她递给我时用手拍打了两下，我接过来，也学她的样子拍打两下，又对着嘴吹了几口，也不见有土吹打下来，只有昏黄的暮色落在上面。

我转过身，街上已经空荡荡了，临街的几家饭馆亮起了灯。我们原打算在库车住一夜，吃了一大盘抓饭后，都有了精神，便又决定继续赶路了，库车城就这样埋在身后的长夜里。

那时我想，我或许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紧赶慢赶，赶在了一个黄昏末世。我喜欢的那些延续久远的东西正在消失，而那些新东西，过多少年才会被我熟悉和认识。我不一定会喜欢未来，我渴望在一种人们过旧的岁月里安置心灵和身体。如果可能，我宁愿把未来送给别人，只留下过去，给自己。

库车老城是一处难得的昔年旧址。我想象中的古老生活，似乎就在那些土街土巷里完整地保存着。有时我会想起那个卖馕的维吾尔族妇女，她面纱后面的一双眼睛，她永远卖不完，剩下一个等着谁的麦黄圆馕。想起摆在老城街边的手工农具、铜器，那一切，会不会在我偶然途经的那个黄昏，永远消失？

直到这次，我再来到库车，看到多年前我一晃而过的老城还在那里。穿城而过的库车河，龟兹古渡、清真寺、满街的毛驴车，仿佛时光在这里停住，一切都沒有过去，只有我的年华在流逝。

随着中年来临，我正一点点地接近那些古老事物。我和它们就像曾经沧海的一对老人一样一见如故。我走了那么多地方，读了那么多书，思考了那么多事情，到头来我的想法和那个坐在街边打盹的老人一模一样。你看他一动不动，就到达了我一辈子要到达的地方。

而我，还在半路上呢。



最后的铁匠

铁匠比那些城外的农民们，更早地闻到麦香。在库车，麦芒初黄，铁匠们便打好一把把镰刀，等待赶集的农民来买。铁匠赶着季节做铁活儿，春耕前打犁铧、铲子、刨锄子、各种农机具零件，麦收前打镰刀。当农民们顶着烈日割麦时，铁匠已转手打制他们刨地挖渠的坎土曼了。

铁匠们知道，这些东西打早了没用。打晚了，就卖不出去，只有挂在墙上等待明年。

吐尔洪·吐迪是这个祖传十三代的铁匠家庭中最年轻的小铁匠。他十三岁跟父亲学打铁，今年二十四岁。成家一年多了，有个不到一岁的儿子。吐尔洪说，他的孩子长大后说啥也不让他打铁了，叫他好好上学，出来干别的去。吐尔洪说他当时就不愿





学打铁，父亲却硬逼着他学。打铁太累人，又挣不上钱。他们家打了十几代铁了，还住在这些破烂房子里，他结婚时都没钱盖一间新房子。

吐尔洪的父亲吐迪·艾则孜也是十二三岁学打铁。他父亲是库车城里有名的铁匠，一年四季，来定做铁器的人络绎不绝。那时的家境比现在稍好一些，妇女们头戴面纱，在家做饭看管孩子，从不到铁匠炉前去干活。父亲的一把锤子养活一家人，日子还算过得去。吐迪也是不愿跟父亲学打铁，没干几天就跑掉了。他嫌打铁锤太重，累死累活挥半天才挣几块钱，他想出去做买卖。父亲给了他一点钱，他买了一车西瓜，卸在街边叫卖。结果，西瓜一半是生的，卖不出去。生意做赔了，才又垂头丧气回到父亲的打铁炉旁。

父亲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祖宗给我们选了打铁这一行都快一千年了，多少朝代灭掉了。我们虽没挣到多少钱，却也活得好好。只要一代一代把手艺传下去，就会有一口饭吃。我们不干这个干啥去。

吐迪就这样硬着头皮干了下来，从父亲手里学会了打制各种农具。父亲去世后，他又把手艺传给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又接着往下一代传。如今在库车老城，他们家族共有十几个打铁的。吐迪的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跟他同在沙依巴克街边的一条小巷子里打铁，一人一个铁炉，紧挨着。吐迪和儿子吐尔洪的炉子在最里边，两个弟弟和侄子的炉安在巷口，一天到晚炉火不断，铁锤叮叮当当。吐迪的妹妹在另一条街上开铁匠铺，是城里有名的女铁匠，善做一些小农具，活儿做得精巧细致。

吐迪说他儿子吐尔洪坎土曼打得可以，打镰刀还不行，欠点儿功夫。铁匠家有自己的规矩，每样铁活都必须学到师傅满意了，才可以另立铁炉去做活。不然学个半吊子手艺，打的镰刀割不下麦子，那会败坏家族的荣誉。吐迪是这个家族中最年长者，无论说话还是



教儿子打镰刀，都一脸严肃。他今年五十六岁，看上去还很壮实。他正把自己的手艺一样一样地传给儿子吐尔洪·吐迪。从打最简单的马黄钉，到打坎土曼、镰刀，但吐迪·艾则孜知道，有些很微妙的东西，是无法准确地传给下一代的。铁匠活儿就这样，锤打到最后越来越没力气。每一代间都在失传一些东西。比如手的感觉，一把镰刀打到什么程度刚好。尽管手把手地教，一双手终究无法把那种微妙的感觉传给另一双手。

还有，一把镰刀面对的广阔的田野、各种各样的人。每一把镰刀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一只用镰刀的手不一样，每只手的习惯不一样。打镰刀的人，靠一双手，给千万只不一样的手打制如意家什。想到远近田野里埋头劳作的那些人，劲儿大的、劲儿小的，女人、男人、未成年的孩子……铁匠的每一把镰刀，都针对他想到的某一个人。从一块废铁烧红，落下第一锤，到打成成品，铁匠心中首先成形的是用这把镰刀的那个人。在飞溅的火星和叮叮当当的锤声里，那个人逐渐清晰，从远远的麦田中直起身，一步步走近。这时候铁匠手中的镰刀还是一弯扁铁，但已经有了雏形，像一个幼芽刚从土里长出来。铁匠知道它会长成怎样的一把大弯镰，铁匠的锤从那一刻起，变得干脆而有力。

这片田野上，男人大多喜欢用大弯镰，一下搂一大片麦子，嚓的一声割倒。大开大合的干法。这种镰刀呈抛物形，镰刀从把手伸出，朝后弯一定幅度，像铅球运动员向后倾身用力，然后朝前直伸而去。镰刀一直伸到用镰者性情与气力的极端处。每把大镰刀又都有微小的差异。也有怜惜气力的人，用一把半大镰刀，游刃有余。还有人喜欢蹲着干活儿，镰刀小巧，一下搂一小把麦子，几乎能数清自家地里长了多少棵麦子。还有那些妇女们，用耳环一样弯弯的镰刀，搂过来的每株麦穗都不会散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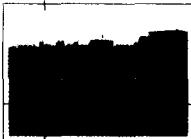


打镰刀的人，要给每一只不同的手准备镰刀，还要想到左撇子、反手握镰的人。一把镰刀用五年就不行了，坎土曼用七八年。五年前在这买过镰刀的那些人，今年又该来了，还有那个短胳膊买卖提，五年前定做过一把长把镰刀，也该用坏了。也许就这一两天，他正筹备一把镰刀的钱呢。这两年棉花价不稳定，农民一年比一年穷。麦子一公斤才卖几毛钱。割麦子的镰刀自然卖不上好价。七八块钱出手，就算不错。已经好几年，一把镰刀卖不到十块钱。什么东西都不值钱，杏子一公斤四五毛钱。卖两筐杏子的钱，才够买一把镰刀。因为缺钱，一把该扔掉的破镰刀也许又留在手里，磨一磨再用一个夏季。

不论什么情况，打镰刀的人都会将这把镰刀打好，挂在墙上等着。不管这个人来与不来。铁匠活儿不会放坏。一把镰刀只适合某一个人，别人不会买它。打镰刀的人，每年都剩下几把镰刀，等不到买主。它们在铁匠铺黑黑的墙壁上，挂到明年，挂到后年，有的挂多年。铁匠从不轻易把他打的镰刀毁掉重打，他相信走远的人还会回来。不管过去多少年，他曾经想到的那个人，终究会在茫茫田野中抬起头来，一步一步向这把镰刀靠近。在铁匠家族近一千年的打铁历史中，还没有一把百年前的镰刀剩到今天。

只有一回，吐迪的太爷掌锤时，给一个左撇子打过一把歪把大弯镰。那人交了两块钱定金，便一去不回。吐迪的太爷打好镰刀，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太爷下世，吐迪的爷爷掌锤，他父亲跟着学徒时，终于等来一个左撇子，他一眼看上那把镰刀，二话没说就买走了。这把镰刀等了整整六十七年，用它的人终于又出现了。

在那六十七年里，铁匠每年都取下那把镰刀敲打几下，打铁的人认为，他们的敲打声能提醒远近村落里买镰刀的人。他们时常取下找不到买主的镰刀敲打几下，每次都能看出一把镰刀的欠缺处：这个地方少打了两锤，那个地方敲偏了。手工活就是这样，永远都



不能说完成，打成了还可打得更精细。随着人的手艺进步和对使用者的认识理解不同，一把镰刀可以永远地敲打下去。那些锤点，落在多少年前的锤点上。叮叮当当的锤声，在一条窄窄的胡同里流传，后一声追趕着前一声。后一声仿佛前一声的回音。一声比一声遥远、空洞。仿佛每一锤都是千年前那一锤的回声，一声声地传回来，沿我们看不见的一条古老胡同。

吐迪·艾则孜打镰刀时眼皮低垂，眯成细细弯镰似的眼睛里，只有一把逐渐成形的镰刀。儿子吐尔洪就没这么专注了，手里打着镰刀，心里不知道想着啥事情，眼睛东张西望。铁匠炉旁一天到晚围着人，有来买镰刀的，有闲得没事看打镰刀的。天冷了还是烤火的好地方，无家可归的人，冻极了就挨近铁匠炉，手伸进炉火里燎两下，又赶紧塞回袖筒赶路去了。

麦收前常有来修镰刀的乡下人，一坐大半天。一把卖掉的镰刀，三五年后又回到铁匠炉前，用的豁豁牙牙，木把也松动了。铁匠举起镰刀，扫一眼就能认出这把是不是自己打的。旧镰刀扔进炉中，烧红、修刃、淬火，看上去又跟新的一样。修一把旧镰刀一两块钱，也有要赖皮不给钱的，丢下一句好话就走了，三五年不见面，直到镰刀再次用坏。一把镰刀顶多修两次，铁匠就再不会修了。修好一把旧镰刀，就等于少卖一把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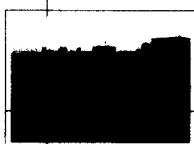
吐迪家的每一把镰刀上，都留有自己的记痕。过去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二百年，他们都能认出自己家族打制的镰刀。那些记痕留在不易磨损的镰刀臂弯处，像两排月牙形的指甲印，千年以来他们就这样传递记忆。每一代的印记都有所不同，一样的月牙形指甲印，在家族的每一个铁匠手里排出不同的形式。没有具体的图谱记载每一代祖先打出的印记是怎样的形式。这种简单的变化，过去几代人數百年后，肯定会有个后代打在镰刀弯臂上的印记与某个祖

先的完全一致，冥冥中他们叠合在一起。那把千年前的镰刀，又神秘地、不被觉察地握在某个人手里。他用它割麦子、割草、芟树枝、削锨把儿和鞭杆……千百年来，就是这些永远不变的事情在磨损着一把又一把镰刀。

打镰刀的人把自己的年年月月打进黑铁里，铁块烧红、变冷、再烧红，锤子落下、挥起、再落下。这些看似简单，千年不变的手工活，也许一旦失传便永远地消失了，我们再不会找回它。那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架一个打铁炉，掌握火候，把一块铁打成镰刀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更重要的是打铁人长年累月，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那种心理。通过一把镰刀对世界人生的理解与认知，到头来真正失传的是这些东西。

吐尔洪·吐迪家的铁匠铺，还会一年一年敲打下去。打到他跟父亲一样的年岁还有几十年时间呢，到那时不知生活变成什么样子。他是否会像父亲一样，虽然自己当初不愿学打铁，却又硬逼着儿子去学这门累人的笨重手艺。在这段漫长的铁匠生涯中，一个人的想法或许会渐渐地变得跟祖先一样古老。不管过去多少年，社会怎样变革，我们总会在一生的某个时期，跟远在时光那头的祖先们，想到一起。

吐尔洪会从父亲吐迪那里，学会打铁的所有手艺，他是否再往下传，就是他自己的事了。那片田野还会一年一年地生长麦子，每家每户的一小畦麦地，还要用镰刀去收割。那些从铁匠铺里，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镰刀，就像一弯过时的月亮，暗淡、古老、陈旧，却永不会沉落。



正在失传的手艺

数年前，我受出版社之约，写一部有关小镇故事的书，开始并没想好要写库车，只是在南疆行走，走到库车时被它的老城留下了。我在库车待了一两个月，后来写了七八万字，起名《库车行》出版了。从那时起，库车成了我在南疆的一个去处，几乎每年都去，有时一年去几趟。库车老城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好像我已经熟悉它了，翻看老城旧照片，发现我五年前拍过的一位卖种子的老妇人，又进入我的镜头，对照前后两张照片，那些就地摆卖的东西依然没变，一个个陈旧的小布袋里，装着各种蔬菜瓜果以及不认识的草木种子。五年前，我曾好奇地蹲在旁边，探头挨个地看着布袋里的种子。五年后我依旧好奇，把那些小布袋里的种子挨个看一遍。照片里的妇人，看上去也没变，一位满脸沧桑的老妇人，她老到头停住了，再不会有什么改变。就像这座老城本身一样，已经古旧到头。

去看的最多的还是铁匠铺，铁匠们早认识了我，知道我把他们写到了书里。这次我去时，却没见到老铁匠吐迪。巷子里三个铁匠炉熄火了两个，只有巷口的炉子还冒烟，铁匠手里的活也明显不多了。我在《最后的铁匠》中写过的有十三代打铁历史的吐迪家族的铁匠炉，只剩下一个烟囱在冒烟，不知道它还能坚持多久。如果铁匠炉全部熄火了，这个家族的人以后会去干什么。以往他们从不为



下一代孩子的生活发愁，只要把手艺传下去，后代们就有饭吃，有事情做。现在，他们祖传的手艺都要传不下去了。不光打铁，那些制陶的、钉驴掌的、做驴拥皮活的各种手艺，都仿佛传到了尽头。那些最后的手艺人，在老城的暮色黄昏里，过着他们最后的旧日子。我一次次的来，只是想看到它还没变。想看见一种古老生活还在延续。可是，它已经在变了。

1. 一口枯井和两棵榆树

克孜尕哈石窟仅有的两棵榆树生虫子了，一种细长的毛毛虫，把一棵树的叶子吃光，往另一棵树上爬。守佛窟的阿木提急坏了，从家里抱来一只花母鸡，放在树杈上，想让鸡帮忙把虫子吃了。可是，鸡好像被满树的虫子和这个光秃秃的山谷吓坏了，窝在树杈上一动不动。阿木提把它的嘴按在虫子上它都不叮一下。哪来的虫子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干谷，怎么会有虫子，方圆几公里都是光秃秃的石头滩，虫子咋知道这个山沟里有两棵榆树呢。阿木提说，虫子可能是乘着拉水的车从村子里带来的，也可能趴在人的脊背上来的，反正虫子突然就爬满树。他的儿子阿不都热和曼到县城买农药去了，



再不把虫子杀死，两棵树就完蛋了。

这个干得土都冒烟的荒山沟里，到处是佛窟遗址，沟里两间小砖房，看守人住的。分布在半



山腰的佛窟都安了木门，每个门上吊两把锁，守佛窟的阿木提管一把，县文管所的人管一把。有来观看佛窟的游客，文管所的人从县上过来，和阿木提一起打开佛窟的门。平常时候沟里只有阿木提一个人。阿木提对这些佛窟和壁画一点都不稀奇，早年，佛窟没保护的时候，附近村里的人只是把它们当成有画的山洞，阿木提小时候经常到佛窟里玩，有的洞窟还被当成羊圈。

阿木提守护克孜尕哈石窟已经有十七年了，他刚来时，这两棵榆树还没有一人高，是一个叫托乎提牙加甫的守窟人栽的，这个人可能在山沟里待急了，想不出排遣寂寞的好办法，就从村子里扛来两棵小树苗，像在村子里栽树一样，挖一个浇水渠沟，间隔两米，把树苗栽进去。可是，这可把麻烦栽下了，山沟里没有一滴水，人喝的水和浇树的水，都要到七八里外的村子去拉。那个托乎提牙加甫没看到树苗长高就离开佛窟，后来又从村子找了几个看守佛窟的人，都是没干几个月，耐不住寂寞，不干了。但这几个守佛窟的人都没让小榆树旱死，有人喝的水，就有树喝的水。到阿木提看守佛窟时，两棵榆树已经扎稳了根，但还是小小的。让阿木提想不到的是，他在佛窟的十七年间，除了偶尔来游客了招呼一下，其余最主要的工作竟是照顾这两棵榆树。现在榆树已经有房子高了。阿木提说，我养个儿子，到了十七岁也能自己生活了。可是这两棵树，越大越依赖人，这么多年，为了给树浇水，一家人的精力都耗进去了。早些年用毛驴车拉水，三四天拉一趟，那时树小，喝水也不多。后来家里有了小四轮拖拉机，树也长大了，一周拉一次，二百八十公斤的大桶，装三桶水，勉强够人和树用一周。

我们现在害怕这两棵树了，阿木提说，它要再长大，我们就养活不起了。早年，树小小的时候，我们盼着它快长，长大了好乘凉。山沟里的土贫瘠，我从家里拉来羊粪，给树施肥。可是，树一年年



长大，用的水也一年年增多，我们不敢让它长了。有好几年，再没给它施肥。只是每周按时浇一次水，保证不让它旱死，我们养活了它十几年，就跟我们的家人一样了。

为了给树浇水他们还挖了一口井。那是在1993年11月，父子俩准备好绳索工具，开始在僵硬的干土中挖井，挖到第二年3月，挖了二十七米深，挖出来的依旧是干土，没有一点有水的意思。父子俩不死心，还要往下挖，这时候，新来的一个汉族主任阻止了他们，说再挖下去太危险，万一塌方出了人命，谁承担。阿木提说，以前管佛窟的阿不拉主任很支持他们。要是阿不拉主任还在，不下台，他们计划挖到八十米深，提土的绳子都是按这个深度买的。挖到八十米再不出水，他们就彻底死心了。

现在，这口没挖出水的枯井，也成了克孜尕哈石窟的文物，来看佛窟的人，都要到井口探望一番。为防有人掉下去，井口钉了木板，封了。我和阿木提就蹲在井口的木板上，说着井和那两棵树的事。阿木提捡一个小石头，从木板缝扔下去，好久，石子落到井底的声音才传上来。阿木提不懂汉语，他看我拿着本子和笔，就知道我要问树和井的事。以前来的记者已经问过无数次，也在媒体上报道过。阿木提一口气说了很多话，古丽花好长时间才给我翻译完。我又问了两句有关佛窟的事，阿木提望了望我，可能 he 觉得，佛窟的事，应该文管所的人说。他只知道树和井的事。我说，你知道这些洞是谁挖的。以前的人。阿木提说。以前你们的祖先也信过佛，你知道吗。那是蒙古人逼着我们信的。阿木提说。

看来佛窟的事阿木提确实说不清楚。他只知道看护好佛窟。早先文管所每月给他发四百三十二块钱，现在长到六百块。至于这两棵树的费用，全由阿木提一家无偿承担，树不是文物，也不会有护养费。它的成长与死活只有阿木提一家人操心了，树不可能在几十米厚的干土层中，找到水分。它们长的越大，耗水越多。这是永远